

新聞歸新聞，政治歸政治

——《大公報》的歷史形象

• 曹立新

一 引言

如何評價一份報紙？從純粹新聞與傳播學的角度看，似乎不是太複雜的問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它的發行人、廣告量，根據這些具體數字衡量它的市場效果和競爭力；也可以從它的新聞質量、言論的權威性、受眾的精英性等方面，來考察它的社會效果和影響力。事實上，1949年前的《大公報》也曾經因為驕人的發行人（抗戰期間在重慶的發行人接近十萬份，超過重慶其他所有報紙發行量的總和）、可觀的業績（新記公司初創時的五萬元股本，到抗戰結束時資產達到六十萬美元）、「充實而精粹」的新聞和「勇敢而鋒利」的社評，贏得過讀者的喜愛和崇高的榮譽（1941年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獎）。歷史似乎早已給了《大公報》「定論」。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命運的改變，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標準的引入，使得對《大公報》的評價這一本來不太複雜的問題變得並不簡單，原有的「定論」竟徹底被否定。

《大公報》老記者、著名史學家唐振常先生曾經總結說：「近年，大陸報刊對於昔年《大公報》（指1949年以前）每多爭論，攻之者以小罵大幫忙五字誅語為結，尊之者每反其言。辯曰：對國民黨政府，《大公報》何止小罵，且往往大罵焉。雙方各各舉出若干事例為證。這樣的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將永無結論。」^①關於如何評價《大公報》的爭論，唐先生直指其焦點在於「小罵大幫忙」五字誅語。唐先生是在二十世紀末說這番話的，他描述的「近年」情況，主要是指1980年代之後的事情。所謂論辯，在此前是不存在的。對於《大公報》，1949年前，幾乎是眾口一詞的稱讚；1949至1980年，則基本是一邊倒的批判。真正的爭論，是1980年之後的事情。

這種爭論的發生，一方面，就像大陸學術界同期發生的其他論爭一樣，是文革結束後人文社會科學突破原有意識形態強制、回歸學術本身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有它自身特殊的背景，比如對所謂「小罵大幫忙」的辯論，比如，這種爭論很大程度上竟然是在原來的《大公報》同人之間進行。

1949年前的《大公報》曾經因為驕人的發行人、可觀的業績、「充實而精粹」的新聞和「勇敢而鋒利」的社評贏得過讀者的喜愛和崇高的榮譽。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命運的改變，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標準的引入，使得對《大公報》原有的「定論」竟徹底被否定。

「小罵大幫忙」，這個說法究竟其來何自？邵燕祥回憶說，他是在1948年聽中共地下黨的同志這樣評價的，因此他猜是來自當時的革命陣營^②。據王芝琛考證，「小罵大幫忙」最早產生於1930年代。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決定「明恥教戰」，主張緩戰，被認為是支持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因此被南洋華僑指摘為「小罵大幫忙」^③。但王芝琛未提供具體材料說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確切的出處倒是見於《大公報》1943年10月1日的社論。這篇題為〈今後的中國新聞界〉的社論裏有一段話：「為了國家利益着想，報紙對於政府，應該是小批評，大幫忙。」如此看來，「小罵大幫忙」，竟是當年《大公報》人的公開主張。後來的所謂辯誣者，努力證明《大公報》不是小罵，而是大罵，甚至只罵不幫忙，恐怕當事者本人就不同意；可是，辯誣的始作俑者，其中有不少正是《大公報》當年的當事人。

二 政治標準取代新聞標準

「小罵大幫忙」的出處見於《大公報》1943年10月1日的社論：「為了國家利益着想，報紙對於政府，應該是小批評，大幫忙。」如此看來，「小罵大幫忙」，竟是當年《大公報》人的公開主張。而後來的所謂辯誣者，卻努力證明《大公報》不是小罵，而是大罵，甚至只罵不幫忙。

歷史為何如此弔詭？問題在於如何詮釋「小罵大幫忙」的含義。上述《大公報》社論是這樣解釋「小批評、大幫忙」的：「批評為難，則幫忙時也就乏力。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一般為民眾以為反正報紙都是政府的應聲蟲，不會有真知灼見，而國際讀者也以為你們的報紙沒有獨立精神，而不重視，到那時報紙雖欲對政府幫忙，而也沒有力量了。」對於這段話，如果硬要探求所謂微言大義，也許可以讀出其中的「良苦用心」，但是，我們毋寧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來作解讀。簡單說，傳播的目的在於溝通信息，整合社會，傳承文明，使社會免於陷入「失範」和「衝突」的危險，媒介因此被形象地稱為社會的「守望人」——警戒，乃是大眾傳播的基本功能之一。警戒的對象，包括社會各個成員和組織，但首先是社會的組織者管理者，即政府；而監督政府的方式，主要就是批評，俗稱「罵」。媒介和傳媒人採訪、編輯和傳播各種信息的合法性權利來源即在於此。因此，對政府的失職提出批評，本質上是傳媒代表公民在維護自身和社會的利益，是傳媒的職責所在，其結果不僅有益於受眾，對政府也不失為一種「幫忙」，如果這個政府的合法性是來自於公民的同意並忠實於選民的利益的話。「為了國家利益着想」，《大公報》的社論以此為自己爭取「罵」的權利，說明「罵」的邏輯。

然而，這種邏輯後來卻成為「小罵大幫忙」和《大公報》本身遭「罵」的原因。1945年11月21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與《大公報》論國是〉，批駁前一天《大公報》的社論〈質中共〉，該文雖然沒有直接批《大公報》「小罵大幫忙」，但實際上表達了這個意思。該社論說：「天下一切大公無私的人們請判決吧！《大公報》在這裏是大公呢？還是大私？在若干次要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築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基本立場。」顯然，對於「小罵」和「大幫忙」的含義，《新華日報》做出了與《大公報》自身完全不一樣的解釋。《大公報》的新聞學解釋，在《新華日報》這裏被替代為政治的、階級立場的解釋。

關鍵是，這一替代，決定性地改變了評價《大公報》的標尺。

1949年以後對《大公報》的攻擊和批判，主要就是針對這一基本立場的。《新華日報》的社論發表三年後，1948年冬，平津戰役打響，中共中央對如何處理天津舊有報刊，尤其是天津《大公報》十分重視。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主持下，研究對解放後天津《大公報》的處理問題，決定發動《大公報》天津館全體職工對《大公報》「擁蔣反共」的反動政治立場和「小罵大捧」的手法進行揭露和批判；對《大公報》進行改組易名，繼續出版。毛澤東親自擬定新的報名為《進步日報》。1949年2月27日，《〈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代《進步日報》發刊詞用主要篇幅揭露了「《大公報》的真實面目」④：

在北洋軍閥時代，《大公報》是依附於軍閥官僚買辦統治集團而生長起來的，等到蔣介石代替了北洋軍閥，建立了賣國獨裁的反動政權以後，它就很快地投到蔣介石門下，成為國民黨政學系的機關報。……小罵大捧是《大公報》的得意手段。它所罵的是無關痛癢的枝節問題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嘍羅，它所捧的是反動統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統治國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其所謂「國家中心」。長期處於言論不自由的情況下的讀者，看了《大公報》的小罵，覺得很舒服，無形中卻受了它「大捧」的麻痹。《大公報》以「小罵」作為欺騙讀者的資本，也以「小罵」來向他們的主人索要更多的代價……因此，《大公報》在蔣介石御用宣傳機關中取得特殊優異的地位，成為反動政權一日不可缺少的幫手。……總之，我們的一切經歷使我們不能不下個斷語：《大公報》實在是徹頭徹尾的一張反動報紙，名為「大公」，實則大私於獨夫，名曰無黨無派，實則是堅決地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做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

與《新華日報》相比，《進步日報》對《大公報》的批判更加深入，也更加猛烈：除了「小罵大幫忙」外，又加上了「政學系的機關報」、「反動派的幫兇」等幾項新罪名。

這已經不是甚麼歷史評價，它實際上是政治審判。天津《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對於即將誕生的新政權而言，可謂在新聞事業管理上的一個示範，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它昭示着一種新的報刊理論統治的確立，而作為舊的報刊理

與《新華日報》相比，《進步日報》對《大公報》的批判更加深入，也更加猛烈：除了「小罵大幫忙」外，又加上了「政學系的機關報」、「反動派的幫兇」等幾項新罪名。這實際上是政治審判。圖為天津《大公報》館。



論的代表，《大公報》的命運必然是被批判；或者說，它預示着一種統一的報刊理論統治的確立，而一切與此理論不和諧的，包括《大公報》所實踐着的報刊理論在內的，必須接受被摒棄的命運⑤。

三 「政治正確」下的「自我討伐」

徐鑄成在回憶解放初期《文匯報》復刊的親身經歷時，詳細講述了所謂「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如何在報刊中確立下來的過程⑥。這一過程包括「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公報》同樣經歷了一個由受到批評到自我批評的過程。就在《進步日報》創刊後不到半年，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報》刊登了〈《大公報》新生宣言〉，宣言稱⑦：

《大公報》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創辦於清末開明貴族之手，民國初年曾落入安福系政客的掌握，1926年大革命開始之年續刊，一部資本出於官僚，政治意識淵源於封建政客及新興資產階級。《大公報》的根源如此，它的政治屬性自然不會跳出這個範疇。……《大公報》雖然始終穿着「民間」「獨立」的外衣，實際是與蔣政權發生着血肉因緣的。《大公報》始終維持着一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層社會中曾有一定影響，即由於此。但是，歷史上所有改良主義者在實質上無不成為反動統治階級的幫閒甚至幫兇。在過去二十幾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報》雖然不斷若隱若現的表露着某些進步的姿態，而細加分析，在每個大階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動方面。……要知道這絕不是偶然的。《大公報》基本上屬於官僚資產階級，與過去的反動政權是難以分離的，總的方向是跟着反動統治走的。……《大公報》有一部分官僚資本，這留待人民政府清查處理。《大公報》同人對過去的錯誤，內心是愧疚的，今當新生，提高警惕，痛感責任，黽勉前進，努力為人民服務。……今後的《大公報》，從經濟觀點上說，是私營企業，而在精神上，是屬於人民的。《大公報》全體職工同人，業已鄭重確定了工作態度：向人民負責。言論、記事、以至廣告，都要向人民負責。一字之錯，一語之非，都不許含糊，都要勤於檢討，勇於改過，尤其方向不許有錯。我們必須努力而小心的這樣做，更誠懇請求廣大讀者給我們幫助，給我們督責。今後的《大公報》，已不是官僚資本了，也不單是我們服務人員的，而確定是屬於廣大人民的了。……今後《大公報》的方向是新民主主義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今後《大公報》的任務，是鞏固新民主主義下四個革命階級的聯盟，在工農階級領導之下，努力爭取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向新民主主義靠攏。

〈《大公報》新生宣言〉與〈《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從內容到文筆都很相似，只不過前者是他人「圍剿」，後者是「自我討伐」。王芸生的這篇〈新生宣言〉草稿是經過楊剛「審閱」的，甚至連周恩來都不止一次看過。楊剛正是〈《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的起草者。

這篇〈《大公報》新生宣言〉，與上述〈《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從內容到文筆，何其相相乃爾！只不過「調子」低一點，只不過前者是他人「圍剿」，這裏是「自我討伐」。原來，王芸生的這篇〈新生宣言〉草稿是經過楊剛「審閱」的，甚至連周恩來都不止一次看過。而楊剛，正是〈《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的起草

者^⑩。據說，楊剛曾發誓要把上海《大公報》改造成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黨報。楊剛的誓願，無非是道出了新政權的聲音。吳廷俊認為，該宣言認為《大公報》基本上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定性是不對的，應該說，《大公報》基本上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宣言》中這一定性的話，雖只有兩字之誤，然成了《大公報》日後承受不公正待遇的『憑據』。」^⑪其實，在政治標準面前，「憑據」未必那麼重要；關鍵還是「政治正確」。

同樣經歷過向「政治正確」轉變的，還有一家與《大公報》同樣是文人論政、同樣是中間勢力、並且同樣負有盛名的報刊——《觀察》。《觀察》是繼1930年代的《獨立評論》之後，在1940年代末期最有影響的政論刊物。1949年後，它同樣幸運得以復刊。它的復刊詞寫道^⑫：

我們發現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會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裏的。我們只批評了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種種反動措施，但並未進一步揭發蔣介石反動政權那種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質。雖然我們是一片赤心地愛着我們的祖國，熱情地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好，但是由於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我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階段，不能把一切外國區分敵友，分別看待。在過去，我們主觀地，自以為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不參加任何黨派，一方面儘管堅決地反對着反動的國民黨，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在過去並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我們並沒有靠攏共產黨，以至我們在客觀上不知不覺地好像自居於中間方面，而帶上了溫情改良主義的色彩。

像王芸生一樣，1946年曾經寫過〈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信仰民主、自由、理性和進步的《觀察》主編儲安平在這篇復刊詞中，也「熟練」地運用起階級分析方法，進行自我檢查和批判。

如果說上海〈《大公報》新生宣言〉是楊剛「審閱」的結果，不能代表王芸生自己的認識，那麼，1960年代初，王芸生、曹谷冰合寫的〈1926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則是他們自己經過兩年「學術研究」的結果。1953年，上海《大公報》和天津《進步日報》合併，在北京出版《大公報》，王芸生掛名社長，實際被排除在編委之外，以便從事「學術研究」。他萬萬沒有想到，後半生從事的第一份「學術研究」，竟是總結解放前的《大公報》歷史。據說，周恩來為此曾找過他三次，最後說這是主席的意思，王芸生才不得不勉為其難，並找曹谷冰與他合作。

王芸生和曹谷冰，兩位新記《大公報》的第二代掌門人，在那篇長文中，對新記《大公報》的三位創辦者是這樣描述的：

《大公報》是官僚資本企業，主持者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個同出身於官僚、地主、資產階級，同是中國大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⑬。

吳鼎昌一生熱衷於作官生活，機謀策畫，慣於作幕後勾當，用盡聰明手段，以求名利雙收，到頭來卻以戰爭罪犯結束了他一生的作官生活^⑭。

胡政之的確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⑮。

新記《大公報》的第二代掌門人王芸生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後，徹底了解如何認識建國前的《大公報》才算「正確」：《大公報》是一張比南京《中央日報》更加反動的報紙，它對法西斯匪首蔣介石採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段。

張季鸞是個典型的帶封建性的資產階級舊式才子文人；他能文善談，打幾圈麻將，唱兩口崑曲，喜歡熱鬧場面，愛聽人恭維，輕財好友，有錢順手花掉，為受人所託而寫的八行書飛遍全國^⑭。

兩位作者在文章最後表示，還要繼續清算《大公報》的歷史。

身為胡政之、張季鸞、吳鼎昌培養的接班人，王芸生和曹谷冰為甚麼會對三位恩人說出如此刻薄甚至污穢的語言？答案還得從王芸生他們1949年後的經歷中尋找。

根據王芝琛的記載，建國後王芸生參加的第一場運動，就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一次座談會上，王芸生發言後，會議主持人竟說：「我們歡迎王芸生先生向祖國人民投降。」王芸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喪失自尊」^⑮。經過此次思想改造運動，王芸生徹底了解如何認識建國前的《大公報》才算「正確」，那就是：《大公報》是一張比南京《中央日報》更加反動的報紙，是國民黨政學系的機關報，它所標榜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大公報》對法西斯匪首蔣介石採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段。王芸生1949年初從香港北上時，曾表示過要拋棄舊習慣，學習新事物；他決沒有想到，這種學習會是一種「喪失自尊」的學習。豈止是「喪失自尊」，為了「政治正確」，他還得傷害到朋友的「自尊」。據說，在臨終前已大徹大悟的王芸生，悔恨自己無論有多大壓力，有多麼悲痛，都不該寫這篇「自我討伐」的長文，因為這篇文章不僅對他自己，也對張季鸞等人使用了極為刻薄甚至污穢的語言。他萬分悔恨自己也參與了那場對《大公報》的「圍剿」^⑯。

說是「自我討伐」，實際上還不是迫不得已？又何止是王芸生心中痛苦？王芸生、曹谷冰的長文發表後，許多《大公報》老人都認為該文「近於偏頗，檢討多於事實」^⑰。儘管如此，當時並無人敢出來糾「偏」示「公」，提供史實。依然是一個迫不得已。直到文革結束後，原《大公報》社評委員李純青首先撰寫了〈為評價《大公報》提供史實〉，對《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中對《大公報》的指責一一作了辯駁，為《大公報》的「文人論政」和「國家中心論」作了歷史的辯護^⑱。徐鑄成也以一「家」之言，就所知、所聞及長期的親身感受，撰寫了《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周雨則懷着寫成一部信史的期望撰寫了《大公報史：1902-1949》，此後，王文彬、曹世瑛、孔昭愷、方蒙等老《大公報》人紛紛撰寫回憶錄或者專著，為《大公報》辯誣、證明。1990年代後，老《大公報》同人的子女開始加入到研究的隊伍之中。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出版了《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更是使許多老《大公報》人看了，「長舒憤懣、如釋重負。」^⑲

四 「新聞專業主義」突破「喉舌論」？

學術界的研究也同時推進。1980年代末，有學者指出，從世界資產階級報業發展的範圍來觀察，「小罵大幫忙」是資產階級合法民辦報刊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實現其輿論監督功能的必然表現；並主張應以「亦捧亦罵」代替「小罵大幫忙」，以更準確地評價《大公報》^⑳。也有人認為，文人論政就是本知識份子之良

1980年代末，有學者指出，從世界資產階級報業發展的範圍來觀察，「小罵大幫忙」是資產階級合法民辦報刊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實現其輿論監督功能的必然表現；並主張應以「亦捧亦罵」代替「小罵大幫忙」，以更準確地評價《大公報》。

知，本人民的立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其所批評，也許有不準確，甚而不正確，要其所歸不是一黨一派之利益。從此立論，就無所謂小罵大罵，小幫大幫^②。甚至有學者指出，《大公報》是一家無黨派的報紙。如果說她對中國的某些黨派有過所謂的「幫忙」的話，那麼，她更多的是幫了共產黨，而不是幫了國民黨；而且是愈來愈多地在幫共產黨，直至最後完全倒向共產黨^③。

邵燕祥還舉了蕭乾的例子，以雜文的筆法，諷刺1949年後的「小罵大幫忙」論。他說：有趣的是，蕭乾在1957年短時期的「鳴放」中發表了有限的文字，特別是後來成為批判重點的〈放心 容忍 人事工作〉一文，在作者本人看來，是「七分肯定，三分批評」的，這不也正是「小罵大幫忙」嗎？怎麼就成了企圖顛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罪狀了呢？邵燕祥的結論是：沒有法治，言出法隨，以言定罪，就會以隨意性代替原則性，發生多重標準、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等現象^④。隨着人們反思到中國近現代史被革命化、黨史化，用劃分階級成分和做政治鑒定來代替對思想進程的客觀的科學探討的弊端，有學者開始提出，評價一份民間報紙，不能以言論上到底是否與某個黨派吻合來評判其是非功過，呼籲要擺脫以政治傾向來評判報紙的標準^⑤。

能不能擺脫以政治傾向來評判報紙？1949年後對《大公報》的批判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標準？

隨着研究的推進，人們對《大公報》的認識，包括對《大公報》批評的認識也逐漸深化。舒展在一篇讀王芝琛著《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的書評中認為，斯大林模式在新聞方面的表現，在中國也是影響深遠的。他介紹了1989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組織的關於斯大林新聞模式的討論會的情況。

在那次討論會上，新華社前副社長李普首先發言：當進入解放區初次聽到兩句話（報紙是不見面的指導員，報紙是公開的文件）感到很奇怪，後來才多少理解了。由於報紙是「指導員」和「文件」，它就獲得了一種不容置疑的特權地位，並影響到新聞政策、新聞體制，甚至新聞文體等一系列問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這種新聞模式有多少合理性和在多大程度上不合時宜？與會者說，用一個概念來概括，這便是「斯大林新聞模式」。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摒棄馬克思恩格斯時代黨的監察和輿論監督對權力相互制約的體制；以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新聞工作的習慣性思維和特權性的宣傳與新聞合一的文體，遂使報刊面目可憎、思想僵化、宣傳說教化；主持政治者和評議政治者一體化，新聞管理人治化，於是形成了體制上的官本位式的衙門化。

舒展感到遺憾的是，這場有意義的討論，以後沒有繼續下去。但他認為，對《大公報》的褒貶評說，之所以一直是中國新聞史、政治史爭論不休、聚訟紛紜的大問題，一個關鍵性的認識在於：如何看待中國各階級、階層裏的「中間勢力」？只有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報》的是非功過，還它一個歷史主義的公道評價^⑥。

由此可見，如何評價《大公報》，在某種意義上，是與突破新聞學的斯大林模式，乃至突破原有意識形態相關的問題。舒展的觀點是發人深思的。不過，評價《大公報》，雖然與評價「中間勢力」密切相關，但是，作為一份報刊，而不是一個政黨，評價的主要標準應該還是根據新聞本身。對於《大公報》而言，尤其是它的新聞言論。

如何評價《大公報》，在某種意義上，是與突破新聞學的斯大林模式，乃至突破原有意識形態相關的問題。評價《大公報》，雖然與評價「中間勢力」密切相關，但是，作為一份報刊，而不是一個政黨，評價的主要標準應該還是根據新聞本身。

問題從「小罵大幫忙」轉到了「文人論政」上。其實，就「小罵大幫忙」而論「小罵大幫忙」，是難以說清楚的。正如論者指出，雙方各各舉出若干事例為證。這樣的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將永無結論。問題在於，憑甚麼罵和幫？怎麼罵和幫？《大公報》的方式，是「文人論政」。所謂文人論政，其出發點是文章報國，是知識份子對國家興亡的關注，和他們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和抱負^{②⑥}。儲安平就曾說過，「我們平日的職業，就是議論政事」。《大公報》也表示：「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②⑦}

文人論政，雖然統稱文人，其實是特指報人，而報人與一般文人不同，前者的職業與新聞有關。徐鑄成曾說過，「報人」這個稱謂就含有極崇敬的意義^{②⑧}。因此，所謂文人論政，實際上是報人以新聞職業的方式從事時事的評論，而新聞職業方式的最重要特徵，就是以事實說話，客觀、獨立、平衡、公允等等——這也是新記《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根本意旨^{②⑨}。文人論政的核心應該是新聞的專業主義，它是一種新聞職業標準，它服庸的是事實的真實性，技術操作上的客觀性，它可能具有成功的商業性與強烈的「政治」性，但是，文人論政的「政」，其本質是「政者，正也」和「政者，眾人之事也」，是「公正」和「公眾」的意思，與政治立場上的中立態度、「中道而行」沒有內在的聯繫，更與「騎牆」之類的政治投機完全無涉。恰恰相反，它常常依據事實本身，對不同的政治力量，包括政治上對立的黨派進行同等批評。文人論政，固然會常常在兩黨之間受到「夾板氣」，但這正是它忠於新聞、而超越黨派之所在，正是傳媒的價值與力量之所在。文人論政的新聞專業主義，與斯大林新聞模式的根本分歧也在這裏。

歷經劫難的王芸生是看透了這一點的。文革結束後，許多老《大公報》人希望恢復《大公報》的出版，對此，王芸生說：沒有必要了，「文人論政已是明日黃花，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了。」^{③⑩}

王芸生的確觸及了問題的本質，新聞專業主義的前提條件，乃是新聞媒介職業的自由和身份獨立^{③⑪}；而「喉舌論」，其本質是「政治第一，技術第二」，也就是專業性從屬於階級性，要求新聞工作「決不能脫離黨的領導，決不允許同黨的基本路線唱反調」^{③⑫}，直接針對的正是防止政治上的自由主義^{③⑬}。因此，如果說1926年新記《大公報》的崛起，「是中國資產階級報業試圖成為『第四權力』的較有成效的嘗試」^{③⑭}，為中國新聞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那麼，這一頁是如此短暫；進入1949年後，隨着新聞「喉舌論」的確立，曾經被翻開的新聞專業主義的一頁又被斷然合上。

文人論政，實際上是報人以新聞職業的方式從事時事的評論，其特徵是以事實說話，客觀、獨立、平衡、公允等。文人論政應該忠於新聞而超越黨派之所在，這也正是傳媒的價值與力量之所在。

註釋

①② 唐振常：〈香港《大公報》憶舊〉，原載《大公報》，「大公園」，1999年12月15日，收入《大公報一百周年報慶叢書》編委會編：《我與大公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13。

②③ 邵燕祥：〈認識一個真實的蕭乾〉，原載《大公報》，「大公園」，1999年2月22日，收入《我與大公報》，頁256。

- ③④⑧⑯⑱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芸生》（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頁131；187-91；195；205；220；251。
- ⑤ 這種報刊理論的「統一」化過程，乃是1949年後中共實行「思想控制」、意識形態「統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李輝曾以胡風悲劇為例，說明了新時代文藝界如何消除「不和諧的聲音」以確立統一權威的殘酷過程，參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45；而1957年夏季的所謂「反右」，其根本原因則在於，包括新聞、文藝界在內的全體知識份子在「鳴放」中表現出的「對思想控制的有力衝擊」。參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85。
- ⑥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12-13。
- ⑦ 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公元724年—1995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470-73。
- ⑧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頁400。
- ⑩ 本社同人：〈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觀察》，1949年第1期，頁28。
- ⑪⑫⑬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5；14；33。
- ⑬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頁18。王芸生、曹谷冰在為這句話加的註釋說：「說胡政之是相當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因為還有個王雲五是更為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
- ⑭ 徐鑄成：《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北京：三聯書店，1986），頁5；參見周雨：《大公報史：1902-194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後記，頁447-48。
- ⑮ 李純青：〈為評價《大公報》提供史實〉，載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頁304-23。
- ⑯⑰ 舒展：〈「中間勢力」——敵耶？友耶？——讀《百年滄桑》的隨記〉，原載《大公報》，「大公園」，2001年10月20-22日，收入《我與大公報》，頁389；376-79。
- ⑱ 謝國明：〈「小罵大幫忙」新論〉，《新聞學刊》，1988年1月。
- ⑳㉑ 方漢奇：〈前言：再論《大公報》的歷史地位〉，載方漢奇主編：《大公報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19；3。
- ㉒ 劉自立：〈「小罵大幫忙」辯〉，《文匯讀書周報》，1998年8月1日。
- ㉓ 《大公報》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關於米蘇里贈獎及今天的慶祝會〉，載《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公元724年—1995年）》，頁251。
- ㉔ 徐鑄成：《報人張季鸞先生傳》，頁6。
- ㉕ 李金銓認為，在二十世紀20年代，中國報業已經發展出一套相當成熟的新聞理念，與西方報業追求新聞客觀、言論獨立的意識互通，其中以天津《大公報》所揭櫫的「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等四大原則為翹楚，實則效法《紐約時報》「無私、無畏」的綱領。這正是今天所謂「媒介專業主義」。見李金銓：〈香港媒介專業主義與政治過渡〉，《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第2期。
- ㉖ 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36。
- ㉗ 郭超人：《喉舌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頁73。
- ㉘ 童兵：《主體與喉舌——共和國新聞傳播軌跡審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39。
- ㉙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頁477。

曹立新 歷史學碩士，西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新聞系講師，學術興趣在傳媒史與農村發展史，已發表〈梁漱溟的報刊理論與實踐〉等若干論文。